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甘畅 王凯¹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基于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 POI 数据, 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等方法, 探析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1)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分布态势, 在片区层面上, 集中分布于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 在地市层面上, 主要聚集于恩施州、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铜仁市。(2)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分布密度的空间差异显著, 湖北和湖南分片区表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 而贵州和重庆分片区核密度值自东向西梯度递减。(3)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显著, 其中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空气质量既是重要的构景要素, 也是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内生动力; 而区域经济、交通通达性、旅游发展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外部调控作用明显。

【关键词】: 武陵山片区 高质量景区 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 GIS 空间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2.7; F3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2021)09-2115-11

依托良好的资源本底发展旅游业已逐渐成为武陵山片区跨越贫困陷阱、消除贫困黏性和斩断贫困循环链的重要方式^[1];然而,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仍存在着条块分割明显、规划营销不统一、带贫效应不强烈等问题, 这严重阻滞了片区整体脱贫进程^[2]。2019年住湘、鄂、渝、黔4省市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议, 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扩大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合作规模, 积极构建片区旅游扶贫合作新格局。旅游景区是旅游发展的物质供给, 也是游客活动的空间载体^[3]。尤其是高质量景区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反映旅游地景观质量、环境质量、建设质量、服务质量, 并集市场知名度大、管理水平高、创收能力强、辐射效应广等众多优势, 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其空间分布格局是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合作规划制定的重要参照, 同时也对“后扶贫时代”片区旅游协作战略谋划影响深远。因此, 探索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扩大片区旅游扶贫合作、破除行政利益藩篱, 加速片区全面脱贫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高质量景区是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培育的重要凭借, 同时也是区域旅游文化生发的重要微观地理单元^[3]。国外有关高质量景区的研究主要以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为对象, 其研究主要呈现出研究要素丰富多样、研究内容系统全面、研究尺度梯度综合的特征^[5], 主要研究了旅游资源开发^[6]、游客体验感知与营销^[7,8]、社区居民参与管理^[9,10]、景区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11~13]等方面内容。质量等级评定是中国实现旅游景区规模化、专业化和优质化发展的重要举措。3A级景区、4A级景区和5A级景区由国家文旅部和省级文旅厅进行评定、审核和批准, 综合反映了旅游地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服务管理和旅游市场营销水平;是区域面向国际国内市场重点推介的旅游产品, 同时也是影响旅游者旅游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重要标尺^[4,5], 因而3A级及以上景区往往被学界和业界认定为高质量景区。国内学者围绕上述高质量景区主要研究了其空间分布结构与类型^[5,14]、空间演变规律与模

¹作者简介: 甘畅(1994~),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经济与旅游扶贫。E-mail: 1583086911gc@gmail.com

王凯, E-mail: kingviry@163.com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9A3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JY191); 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5010002)

式^[15,16]、关键驱动因子与作用机理等方面^[17,18];空间尺度主要包括国家^[19]、流域^[6]、城市群^[14,18]、省区^[15~17]等;研究方法主要借助地理空间分析法和数量统计方法并辅助 GIS 空间可视化技术^[3,4,14]。3A 级及以上景区发展规模大、示范效应强和减贫作用突出,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其空间分布特征是片区旅游扶贫协作战略制定的重要参考,但目前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区这一尺度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鲜见。

综上所述,3A 级及以上景区具有较高旅游景观质量、旅游管理质量、旅游服务质量等优势,在吸引游客观光游览、打造地区旅游品牌和促进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中意义重大,本文首先结合前述 3A 级及以上景区特点与优势,综合参考《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定与评定》以及李冬花等^[5]、麻学锋等^[17]、唐承财等^[18]的相关研究成果,将 3A 级及以上景区定义为高质量景区。其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析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特征。最后,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出发,运用 GIS 空间叠加分析和地理联系率厘清影响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特性的核心因素,以期为推进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建立健全片区旅游扶贫协作机制和加速片区精准脱贫进程提供实践参考。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武陵山片区是国务院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国家率先启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示范区。片区共包含 71 个县(市、区),其中共有 42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3 个省级贫困县。《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9》^[20]显示:截至 2019 年,武陵山片区仍有 111 万贫困人口,其总量仅次于乌蒙山区和滇黔桂石漠化区,距离 2020 年全面脱贫仅剩一年,如何加快精准扶贫、加速全面脱贫和防止地区返贫事关片区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旅游资源与贫困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耦合性^[21],武陵山片区也不例外,截至 2018 年底,片区共有 3A 级及以上景区(点)179 个;2018 年全年共接待游客 5.39 亿人次,共实现旅游收入 4339.88 亿元(占片区 GDP 总量的 47.8%),旅游业已成为武陵山片区消解贫困黏性、跨越贫困陷阱和斩断贫困循环链的重要支柱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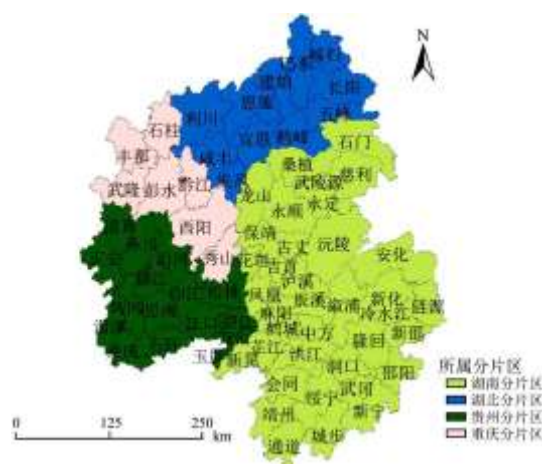


图 1 武陵山片区地理位置

1.2 研究方法

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等方法能系统、全面、清晰、直观地勾勒出地理空间单元的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均衡状态和空间分布密度^[5];地理联系率方便计算,能直接分析地理空间单元分布的驱动因素^[22],因而本文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探析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2.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通过计算点要素平均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距离的比值探测其空间分布形态^[18]。本文以高质量景区作为点状要素，采用最邻近指数判别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形态。计算公式如下：

$$R = \overline{r_1} / \overline{r_E}$$
$$\overline{r_E} = \frac{1}{2} \sqrt{\frac{A}{n}}$$
(1)

式中：R 为最邻近指数； $\overline{r_1}$ 为实际平均最邻近距离； $\overline{r_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 为武陵山片区的面积；n 为高质量景区数量。若 $R > 1$ ，则表示高质量景区呈现均匀分布；若 $R = 1$ ，则表示高质量景区为随机分布类型；若 $R < 1$ ，则表示高质量景区呈现集聚分布态势。

1.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度量空间要素集聚分布的重要标准^[22]，本文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反映高质量景区在 4 大分片区的集聚状态。其计算公式如下：

$$G = 100 \times \sqrt{\sum_{i=1}^n \left(\frac{X_i}{T} \right)^2}$$
(2)

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G 越大说明高质量景区分布越集中，反之，G 越小则高质量景区分布越分散； X_i 表示第 i 个片区/地市高质量景区分布数量；T 为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总量；n 为分片区/地市数量。

1.2.3 不平衡指数

本文运用不平衡指数测度高质量景区在 4 大分片区和 12 个地市的分布均衡状态，其计算公式如下^[23]：

$$S = \frac{100 \sum_{i=1}^n Y_i - 50(n+1)}{100n - 50(n+1)}$$
(3)

式中：S 表示不平衡指数，若 $S = 1$ ，则说明高质量景区仅分布于某一个片区/地市， $S = 0$ 则高质量景区均匀分布于各分片区/地市； Y_i 表示各分片区/地市高质量景区数量占总数比重大小后按照从小到大的第 i 位累积百分比；n 为分片区数量。

1.2.4 核密度分析法

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探析高质量景区在武陵山片区的集中分布区域。其计算公式如下^[24]：

$$g(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4)$$

式中： $g(x)$ 表示旅游景区在 x 处的密度函数估计值； n 为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数量； x_i 表示点 i 的坐标位置； h 表示带宽； k 为权函数，用以估计数据点的数量和利用程度。

1.2.5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主要基于相似度反映 2 个地理属性值的空间联系^[22]，本文采用地理联系率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支持与高质量景区数量的联系，其计算公式如下：

$$L = 100 - 0.5 \sum_{i=1}^n |P_i - G_i| \quad (5)$$

式中： L 为地理联系率； n 为武陵山片区县(市、区)数量； P_i 和 G_i 分别为第 i 个县域高质量景区数量和 GDP/固定资产投资) 占片区总量的比例，地理联系率越接近 100, 说明高质量景区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联系越紧密。

1.3 数据来源

本文 3A 级景区和 4A 级景区名录主要来源于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的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5A 级景区名单源自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时间截至 2018 年 12 月。通过 GoogleEarth 拾取各高质量景区坐标点，将其导入 ArcGIS10.2 获取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图(图 2)。社会经济类数据主要采自 2019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 4 省区统计年鉴，旅游方面的数据来源于武陵山片区 71 个县(市、区)2018 年统计公报。武陵山片区行政区划矢量图层以及地形、坡度和河流水系等地理空间数据主要来自 1:100 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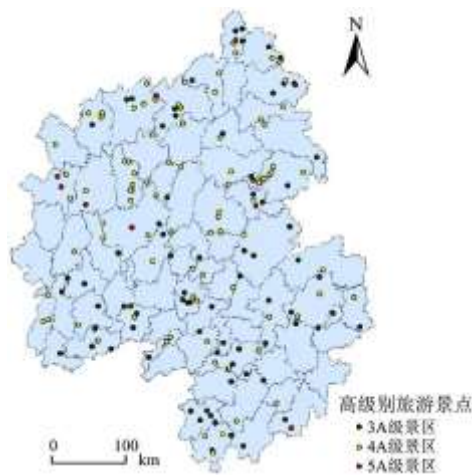


图 2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

2 实证分析

2.1 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2.1.1 空间分布类型

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厘清武陵山片区整体以及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 4 大分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类型。表 1 显示：武陵山片区、湖北分片区、湖南分片区和重庆分片区的最邻近指数分别为 0.731、0.963、0.827 和 0.911,这说明高质量景区在上述区域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同时相对武陵山片区整体而言，湖北、湖南和重庆 3 个分片区高质量景区的空间集聚程度稍弱。贵州分片区的最邻近指数为 1.025,这显示贵州分片区的高质量景区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匀。综上所述，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关联程度较大，这有利于片区间、地市间和县区间旅游资源整合，形成全景轴线和连线成面的旅游景区空间关联格局；进而充分发挥高质量景区综合辐射效应，为周边旅游扶贫示范村提供稳定的客源，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加速其脱贫摘帽。

表 1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最邻近指数

区域	国土面积 (km ²)	高质量景区数量 (个)	最邻近指数	空间分布类型
湖北分片区	32270	41	0.963	集聚型
湖南分片区	86126	84	0.827	集聚型
重庆分片区	22735	26	0.911	集聚型
贵州分片区	30900	28	1.025	均匀型
武陵山片区	172031.4	179	0.731	集聚型

2.1.2 空间分布数量特征

表 2 显示：在片区层面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 4 大分片区高质量景区数量占比分别为 22.906%、46.927%、14.525% 和 15.642%,这说明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在分片区上分布不均匀，主要分布于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在地市层面上，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主要分布于恩施州 (16.760%)、怀化市 (16.201%)、渝东南地区 (15.642%)、湘西州 (10.056%)、张家界市 (9.497%) 和铜仁市 (9.497%) 等片区核心城市，而常德市 (1.118%) 和益阳市 (1.118%) 的总占比不足 2%,这说明在地市层面上，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也呈现明显的不均匀状态。

2.1.3 空间分布均衡特征

根据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 (2), 分别计算基于分片区角度和地市角度的地理集中指数，结果显示：(1)分片区角度的高质量景区地理集中指数为 62.525,若高质量景区均匀分布于 4 大分片区，则其地理集中指数为 44.750,但实际的地理集中指数明显大于理想状态下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在分片区层面上分布不均衡。(2)地市角度的高质量景区地理集中指数为 34.278,若高质量景区平均布局于各地市，则此时的地理集中指数为 14.916;但实际地理集中指数远远大于均匀分布状态下的值，这说明了在地市层面上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均衡状态性同样较差。

借助公式 (3) 分别计算基于片区和地市角度的不平衡指数，结果表明：无论在片区 (0.348) 还是在地市 (0.331) 层面上，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均较差。基于高质量景区累积百分比数据 (表 2), 分别绘制地市层面和片区层面的洛伦茨

曲线。图 3 显示：曲线均呈现明显的上凸形态，在片区层面上，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的累积占比为 69.833%;而在地市层面上，恩施州、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铜仁市的累积占比高达 77.653%,这进一步佐证了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在片区和地市的空间分布均具有非均衡的特质。

表 2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数量分布

区域	高质量景区数量(个)			合计(个)	占比(%)	累计百分比(%)
	AAA	AAAA	AAAAA			
恩施州	11	17	2	30	16.760	16.760
怀化市	20	9	0	29	16.201	32.961
渝东南地区	5	19	4	28	15.642	48.603
湘西州	7	11	0	18	10.056	58.659
张家界市	6	9	2	17	9.497	68.156
铜仁市	11	5	1	17	9.497	77.653
宜昌市	5	5	1	11	6.145	83.798
遵义市	3	6	0	9	5.028	88.826
娄底市	5	3	0	8	4.469	93.295
邵阳市	5	2	1	8	4.469	97.764
常德市	1	1	0	2	1.118	98.882
益阳市	1	1	0	2	1.118	100.000
湖南分片区	45	36	3	84	46.927	46.927
湖北分片区	16	22	3	41	22.906	69.833
贵州分片区	14	11	1	26	15.642	85.475
重庆分片区	5	19	4	26	14.525	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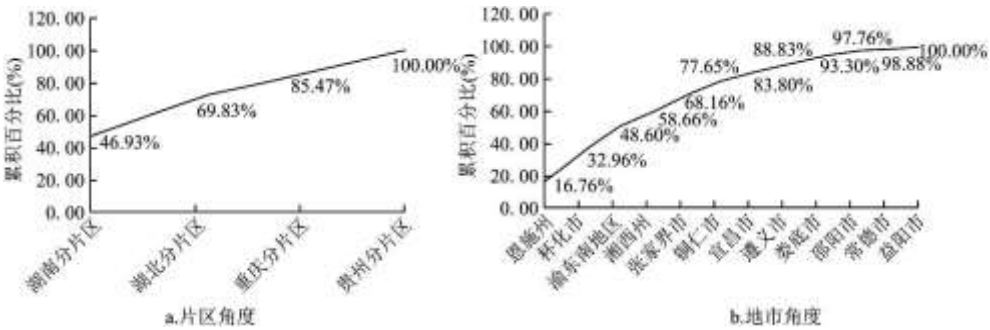


图3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

2.1.4 空间分布密度特征

如图4所示：(1)在湖北分片区，高质量景区形成了以利川市东南边缘和恩施市西南地带为中心并向外围梯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而以秭归县南部和长阳县北部为中心的二级核心区远离一级核心区的辐射圈，在空间上呈现“孤岛”式分布。近年来，以利川市、恩施市、长阳县和秭归县为代表的县(市、区)遵循“开发一片景区，活化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旅游扶贫开发原则，积极构建高密度、高级别和高质量的旅游景区集群，成功打造了诸如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清江画廊等享誉海内外的景区(点)，因此高质量景区在上述区域形成块状聚集。(2)在湖南分片区，高质量景区形成了以凤凰县为中心的东南延伸带和东北延伸带；2个极核区(以吉首市、凤凰县和麻阳县为核心的凤凰县极核区，以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西部和桑植县东部为核心的张家界市极核区)则镶嵌分布于三个延伸带内。以张家界为典型代表的高密度极核区，旅游资源禀赋优越、旅游开发起步早、旅游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同时按照“错位发展、全域旅游”的要求，以张家界大峡谷、天门山风景区、茅岩河风光带为核心增长极，积极打造了红河谷、宝峰山、八大公山等数10条旅游精品线路，有效串联了域内外旅游景点，因而高质量景区在此高度聚集。(3)在贵州分片区和重庆分片区，高质量景区尚未形成高密度极核区，核密度值表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黔江区与酉阳县东北地区的核密度值较高。上述县域狠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村村通公路”为突破口，积极打造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成功创建了酉阳桃花源风景区、龚滩古镇、黔江小南海和黔江濯水古镇等高质量景区，因此该区域的核密度值明显较高。相比重庆分片区，贵州分片区的高核密度值区域覆盖范围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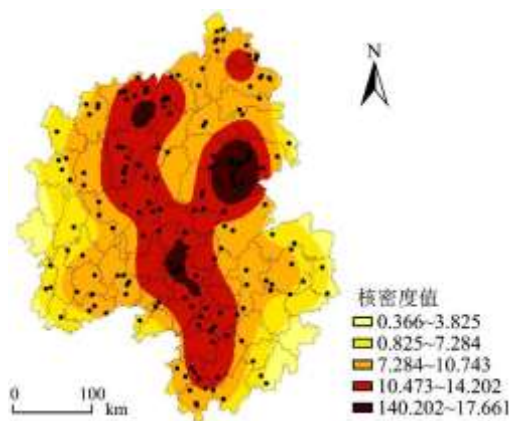


图4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核密度空间分布

2.2 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武陵山片区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在地域上的客观反映，不同驱动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的合力推动这一格局的形成^[3, 16, 17]。借鉴王洪桥等^[3]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对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根据频度统计法，选取以往研究使用频率较高的驱动因素指标。旅游资源禀赋是高质量景区开发与建设的基础，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清新空气不仅是重要的构景要素，同时与其他景致组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高质量旅游区^[5, 26]。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是高质量景区稳定健康发展的外部推力，区域经济发展为高质量景区申报与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6]；交通网络的接驳与贯通能有效串联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形成系列特色旅游线路，促进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重组与优化^[26]；旅游收入直接反映了区域旅游发展强度，旅游发展强度越大，旅游景区开发与整合的机会便会越大，越有利于为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营造更加优越的产业环境^[27]；旅游景区的开发，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区，政府的旅游发展规划、旅游资金投入、旅游品牌打造、旅游营销设计均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旅游景区的空间选址与布局，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本文运用

固定资产投资表征政策支持力度^[17]。

2.2.1 自然因素

(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是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条件，多元化的地貌不仅自身可作为风景，如恩施大峡谷、张家界天门山、江口梵净山、新宁崀山、思南石林等，同时与其他构景要素进行组合形成别具一格的景致，如矮寨奇观旅游区、紫鹊界梯田风景名胜区、武隆喀斯特旅游区等；另外丰富的地形地貌也会影响区域文化塑造和居民生产生活习惯形成，进而影响人文景观的塑造，如由于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外界扰动效应较弱，使得唐崖土司城遗址、黔江土家十三寨、寨沙侗寨等人文景点保存完好。将武陵山片区高程图、坡度图与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图耦合分别得到图 5a 和图 5b。图中显示：两大高海拔地带：慈利县西南延伸至石阡县和恩施市自西向东绵延至长阳县的高质量景区数量明显多于安化县一会同县一线东南以及来凤县—余庆县一线西北两大低缓丘陵地带，多元化的地形地貌对于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结构的发育与演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恩施市境内的恩施大峡谷景区，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幽长，起伏的海拔增加了峡谷空间层次美感，正是由于海拔高度和地面坡度造就了绝壁悬崖、千仞孤峰、绝美地缝等世界级旅游资源，成为展现灵秀湖北靓丽的“名片”。

(2) 河流水系。

河流水系是重要的构景元素，瀑落深潭、惊涛拍岸、流水淙淙、泉泄清池、溪流山涧等多样化的水体形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水体景观，通过景观的视觉美、听觉美、动态美和形象美吸引八方游客观光游览。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因水而兴、因水而盛，域内存在众多的高质量水体景观，如清江画廊、巴东神农溪旅游区、九畹溪旅游区、茅岩河景区、涪江旅游区、洪渡河景区、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等，为片区旅游产品与业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缓冲区分析显示：共有 116 个高质量景区落入河流水系 5km 的缓冲区中，占高质量景区总数的 64.8% (图 5c)，这说明河流水系是影响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映射出片区高质量景区具有“亲水”的空间分布特质。

(3)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尺，旅游是游客逃离快节奏生活和追求身心愉悦的过程，因而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清新的空气是增强目的地吸引力的重要凭借。武陵山片区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系统核心区，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2018 年片区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43d，空气质量优良率高达 94.49%，这为区域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创新和生态旅游品牌打造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图 5d 显示，空气质量优良率低于 83.56% 的高质量景区仅为 9 个，占比仅为 5%，这说明了空气质量较好的地区往往成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聚集区。武陵山片区整体空气质量优越，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水平高，如梵净山、天门山、武陵源等高质量景区凭借其洁净的空气，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康养健身。

2.2.2 人文因素

(1) 区域经济发展。

图 6a 显示：除武陵源区和江口县等个别县域外，GDP 大于 99.987 亿元的县域，如恩施市、巴东县、黔江区、永定区、洪江市等县(市、区)的高质量景区数量明显多于周边地区，这说明了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是高质量景区开发与创建的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公式(5)，算得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高质量景区数量的地理联系率为 99.68。这说明了高质量景区空间布局往往倾向于区域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带，区域经济实力越雄厚，用于旅游资源开发、配套设施完善、产品业态更新和品牌形象推广的财政投

入越多，高质量景区升级换代的金融环境更优渥。如洪江市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多措并举抓旅游投资，充分挖掘本市旅游文化资源，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成功打造了以黔阳古城、洪江古商城和嵩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高质量景区，为区域旅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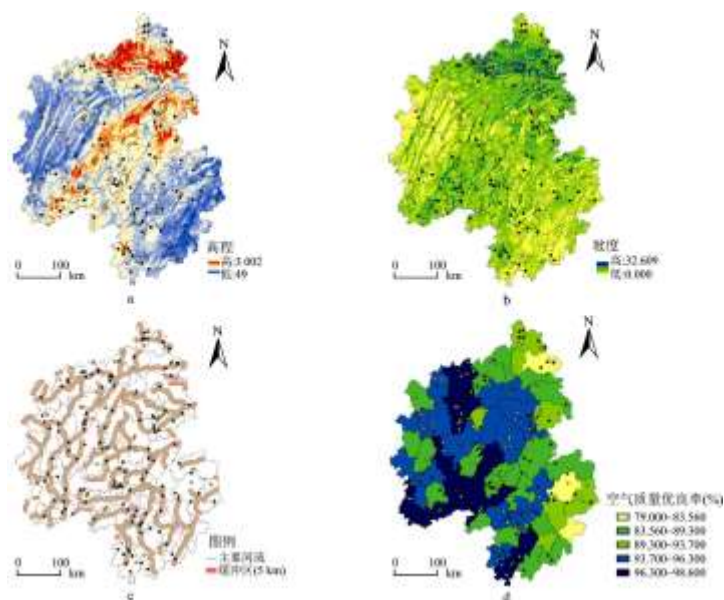


图 5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

(2) 交通通达性。

交通网络通过“时空压缩”效应，缩短游客“心理距离”，增强游客旅游意愿^[23]。游客大规模涌入会倒逼景区服务设施完善，促进景区质量等级提升，同时交通线路的贯通与接驳可通过“廊道效应”促进周围交通服务水平提升，稀释区域旅游发展的边界阻碍效应，加速高质量景区空间集聚，促进高质量景区由孤立点状分布转向轴线或网状布局。高速公路是贫困山区连接外域的重要桥梁，同时也是助推旅游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图 6b 显示：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沿高速公路分布态势明显，如长阳县—丰都县一带的高质量景区主要沿沪渝高速公路延伸；慈利县—武隆区一带的高质量景区沿包茂、龙吉和张花等高速公路分布；溆浦县—湄潭县一带的高质量景区则沿长芷、包茂、杭瑞等高速公路分布。如恩施州各级政府抢抓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先后建成恩施大峡谷大桥、恩施大峡谷旅游公路、野三河旅游公路，通过“穿针引线、以点带面、对外辐射、空间传导”功效的发挥，促进区域高质量景区有效衔接和有序整合，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区域内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

(3)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收入越高，地区旅游发展能力越强，一方面，政府对旅游的重视程度也会越高，“政策红利”的倾向性越强，高质量景区申报和创建的外部环境越好；另一方面，区域旅游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旅游发展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释放，使得区域旅游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拓展，从而加速高质量景区空间结构的发育与成长。图 6c 显示：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与旅游收入水平具有较好的空间耦合性，永定区、黔江区、恩施市、秭归县、江口县等旅游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均分布着较多数量的高质量景区。这一方面说明了高质量景区是推动贫困山区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证实了旅游经济发展为高质量景区的申报与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有利于高质量景区集聚态势的形成。如江口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梵净山为金字招牌，依托其稳定的旅游收入，全面打造以寨沙侗寨和亚木沟为代表的周边旅游景点，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旅游景区空间布局。

(4)政策支持。

借助公式(5),算得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数量与政策支持的地理联系率为 99.45,这说明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布局与选址与政府的宏观政策息息相关。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拓宽旅游投融资渠道、规范旅游企业开发行为,进而有助于加速旅游资源开发进程,打造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高质量景区。在微观层面上,由于武陵山片区为连片特困区,贫困人口覆盖范围广,景区开发是带动片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模式,政府通过旅游技能知识培训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能多维度地增加当地贫困居民的支持力度,从而为旅游景区后续开发营造了良好的社区环境,有利于旅游景区的集聚。如 6d 所示,恩施市固定资产投资大于 199 亿元,区内聚集较多的高质量景区,这主要得益于恩施市“筑巢引凤”,不断引进国内大型旅游投资集团参与恩施大峡谷、恩施土司城、土家女儿城等高质量景区创建;同时通过房屋、土地、劳动等入股实现贫困居民产业分红,为高质量景区后续打造奠定了优渥的社区环境,因而恩施市分布着较多的高质量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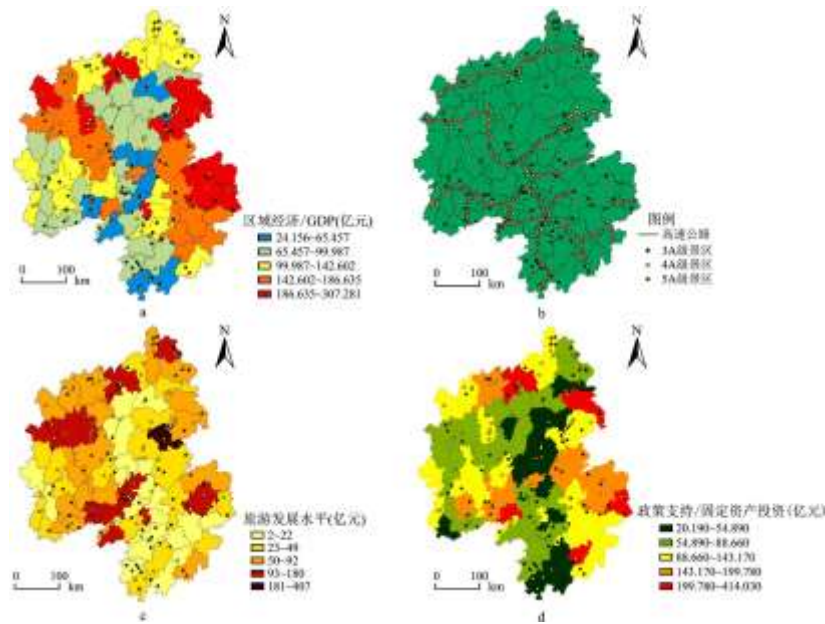


图 6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人文因素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以武陵山片区 179 个高质量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 ArcGIS10.2 平台,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出发,运用空间叠加分析和地理联系率厘清了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整体表现出集聚分布的状态,湖北、湖南和重庆 3 个分片区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但贵州分片区表现出均匀型空间分布。(2)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在片区层面上,高质量景区集中分布于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而在地市层面上,高质量景区主要布局于恩施州、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铜仁市。(3)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表现出具有等级的“核心—边缘”结构,而重庆分片区和贵州分片区核密度值呈现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4)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显著,其中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空气质量既是重要的构景要素,也是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内生动力;而区域经济、交通通达性、旅游发展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外部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3.2 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针对高质量景区整体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武陵山片区应坚持以武陵源区、恩施市、黔江区、武隆区、凤凰县、江口县等旅游经济发达的县域为依托,以高铁和高速线路为纽带,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土司遗址、南方喀斯特、梵净山等世界遗产以及恩施大峡谷、清江画廊、桃花源旅游区等 5A 级景区为支撑,推动区域高质量景区联动发展,着力打造精品优质旅游线路,建立健全跨省市旅游扶贫合作机制,弱化高质量景区空间布局非均衡性,推进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优化。(2)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的形成是不同自然因素空间重组的结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武陵山片区应坚持生态文明理念,树立生态优先和保护优先的可持续旅游扶贫发展思路,避免因大规模旅游开发和游客大规模涌入而引致高质量景区资源品质降低、吸引力弱化和生态系统退化,从而导致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同时武陵山片区应持续加大对高质量景区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恩施、张家界、黔江、铜仁等中心性区域交通设施,形成高安全、快速度和无障碍的旅游交通环线,通过高铁和高速线路的接驳与贯通促进片区高质量景区有序整合。(3)高质量景区发展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减贫效应广,距离 2020 年全面脱贫仅剩一年时间,武陵山片区应以高质量景区空间格局优化为契机,通过高质量景区资源置换、市场互推和信息共享推动区域旅游扶贫合作,做大片区旅游发展的“蛋糕”;建立健全片区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贫困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分好片区旅游发展的“蛋糕”,从而加速精准脱贫和降低区域返贫风险。

参考文献:

- [1]龙祖坤,杜倩文,周婷.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J].经济地理,2015,35(10):210-217.
- [2]刘洋.推动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合作[N].人民政协报,2019-08-22(4).
- [3]王洪桥,袁家冬,孟祥君.东北地区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7,37(6):895-903.
- [4]王艾萍.中部地区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布局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9(3):271-274.
- [5]李冬花,张晓瑶,陆林,等.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0,40(5):70-80.
- [6]CANALE R R,DE SIMONE E,DI MAIO A,et al.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tourism attractiveness:The case of italian provinces[J].Land Use Policy,2019,85:114-120.
- [7]PORIA Y,REICHEL A,COHEN R.Tourists perceptions of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its designation[J].Tourism Management,2013,35(4):272-274.
- [8]POKU G,BOAKYE K A A.Insights into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expressions of visitors to the Kakum National Park: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J].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9,32:1-8.
- [9]TATUM K,PORTER N,HALE J,et al.A feeling for what's best: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notions of appropriate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in dartmoor national park,england[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7,56:167-179.
- [10]CHI C G,CAI R,LI Y,et al.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world heritage sites[J].Tourism Management,2017,63(11):209-222.
- [11]ERDOGAN N,TOSUM C.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ourism accommodations in the protected areas:Case of goreme

historical national pa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9, 28(3):406-414.

[12] SEIDL A.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heritage and early efforts at tourism in Albania[J]. Ecosystem Services, 2014, 10(11):164-171.

[13] SONG D, KUWAHARA S. Ecotourism and world natural heritage: Its influence on islands in Japan[J].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2016, 5(1):36-46.

[14] 卞显红. 长江三角洲国家 AAAA 级旅游区空间结构[J]. 经济地理, 2007(1):157-160.

[15] 郭向阳, 明庆忠, 穆学青, 等. 云南省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变[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5(2):88-95.

[16] 陆保一, 张恩伟, 明庆忠, 等. 云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J]. 山地学报, 2019, 37(6):879-890.

[17] 麻学锋, 杨雪.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1902-1916.

[18] 唐承财, 孙孟瑶, 万紫微.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10):204-213.

[19] 李会琴, 李丹, 董晓晴, 等. 中国 5A 级景区分布及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0):178-184.

[20]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21] 王凯, 甘畅, 王梦晗, 等. 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 28(4):863-871.

[22] 方叶林, 黄震方, 李经龙, 等. 中国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及其产业特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6):1273-1284.

[23] 周李, 吴殿廷, 李泽红, 等. 中蒙俄经济走廊自然旅游资源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 资源科学, 2018, 40(11):2168-2176.

[24] 王兆峰, 刘庆芳.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 40(3):419-427.

[25] 张晓梅, 程绍文, 孙雅馨. 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5):95-99.

[26] 王武林, 杨文越, 曹小曙. 武陵山区公路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水平协调度研究[J]. 人文地理, 2019, 34(6):99-109.

[27] 刘敏, 郝炜. 山西省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20, 75(4):878-888.